

20_{世纪} 中国古典文学 学科通志

第4卷

主 编写指导 徐公持
编 刘敬圻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04AZW003)

20世纪

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

第4卷

顾问 傅璇琮 徐公持
特聘编写指导 徐公持
主编 刘敬圻
副主编 张安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 第 4 卷 / 刘敬圻主编.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328-6302-0

I. ①2…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概况—20 世纪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2470 号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

第四卷

主编 刘敬圻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3 传真: (0531)82092663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mm × 1230mm 32 开本

印 张: 21.375 印张

字 数: 51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8 - 6302 - 0

定 价: 63.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539—2925888

目 录

目
录

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文学遗产“批判地继承”理论的 演变轨迹·····	001
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对古代文论的重视和整理研究·····	036
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的古典文学选本·····	066
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的文学古籍整理·····	092
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古典文学专业书籍和专业刊物的 出版·····	138
“文革”中的古典文学研究·····	175
70年代后期古典文学学科的拨乱反正·····	200
“文革”后学科基础建设的重新确定·····	223
钱锺书的《管锥编》·····	245
80年代各高校的中国文学史教材·····	274
红学在新时期的复兴(上)·····	290
红学在新时期的复兴(下)·····	344

◎
第
四
卷

001

80年代的人性论、人道主义问题与古典文学研究	389
新方法的引入与古典文学研究(上)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古典文学研究	424
新方法的引入与古典文学研究(下)	
——接受美学、定量分析与古典文学研究	484
关于古典文学宏观研究	525
古典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上)	
——以音乐、民俗与古典文学关系研究为中心	561
古典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中)	
——20世纪佛教与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595
古典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下)	
——20世纪道教与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624
参考文献	654

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文学遗产 “批判地继承”理论的演变轨迹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开始,中国大陆的一切思想和学术研究都是在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开展的,古典文学研究也不例外。就其根本来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对古典文学进行价值重估,以马克思文艺理论为标准,建立了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五六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主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着重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来开掘文学的阶级属性、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对唯心史观进行批判。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思想是对待文学遗产的指导思想

关于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毛泽东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明确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来研究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当作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事业的一部分。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阐述继承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地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

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

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原则: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②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说: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第667~6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①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实际已经提出了研究古典文学的一系列指导原则。首先,毛泽东在这几段话中明确地指出了对古代文化遗产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其次,明确批判继承的目的,不是颂古非今,而是为了发展民族新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这实际也就是要求古典文学研究者必须具有清醒的当代意识,必须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当代的文化建设联系起来。再次,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基本方法和评价标准问题,对于古代文化的研究,首先要进行清理和评价,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然后要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

关于如何清理和批判,毛泽东非常看重态度问题,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②

因此,艺术评价的标准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也就是全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第8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把毛泽东这种文艺思想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主导思想。周扬在会上的报告明确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提到旧文艺的改造问题时说:

旧文艺里一切坏的部分、一切不适合于人民利益人民要求的部分一定就会消灭;另外有一些合理的、可以发展的东西就会慢慢地提高、进步,逐步变为新文艺的组成部分,这一部分就是有前途的,而不是被消灭了的。我们要这样看,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我们如果认为旧文艺什么都好,什么都保存,那样就会走到复古的路上去了;另外我们如果认为什么都不好,什么都否定,或置之不管,那样就是对于民族传统和群众感情采取错误的态度,就是违背了我们普及第一的主张,同样也不合于我们的历史观点。

这段话实际上是重新申说了毛泽东对古代文学艺术的观点,把古代文学艺术分为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需要区别对待。从此“批判地继承”也就成为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古典文学研究体系奠定了根本性理论基础。

50年代前期“批判地继承”的初步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学术界就展开了一场小规模关于如何对待文学遗产的讨论,这是由一封中学生来信引发的。《文艺报》1949年第1卷第5期“文艺信箱”栏目发表了中学生樊平请教是否应该学习旧文学的来信,叶圣陶因为工作比较忙,就请杜子劲、叶蠖生代为答复,并表示同意杜、叶二人的观点。杜、叶二人是这样答复的:旧文学可以阅读,不可以拟作。而且阅读是有条件的:1. 有选择的,2. 有批判的,3. 有目的的,4. 有指导的。而且希望中学生更注意当代国内外活生生的人

民的生活和思想。

杜、叶二人的答复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文艺报》1949年第1卷第6期“关于中国旧文学的学习问题(讨论)”刊发陈涌《对关于学习旧文学的话的意见》一文。陈涌认为杜、叶二人对中国旧文学的技术方面评价过低,如“简单的否认了中国过去文学重要的遗产之一的诗词的价值”。同期叶蠖生《关于中国旧文学的技术水平和接受文学遗产问题》对陈文进行了答复。叶文说:“既然社会的发展是进化的,作为人类精神产物的文学记述是否也是进化的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例如《水浒》这部书,在中国旧文学中应当是好的作品了,可是它的技术上的粗疏却到了很可观的程度,当它叙述宋江劫取进香的太尉时,是把从开封到华山去的路径认为可以经过山东的。又如《红楼梦》的叙述是更比水浒细腻的,但每回大都用吃饭作结束,不是太单调了么?”叶文也承认“文学是通过人类思维对于客观的反映,好的作品,都是除了一定技术水平之外,还强烈的反映出作者所处的社会时代的和个人的特性”,“无论社会如何进化,古代作品仍有它存在的价值”。因此必须先具有科学的正确态度,才能更好地接受文学遗产,而且主要接受作品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生活、思想、感情。

叶文的发表引起了更大范围的讨论,问题已经由中学生应不应该读旧文学扩大到对中国旧文学遗产的态度问题,成为了带有原则性的争论。例如王子野《〈关于中国旧文学的技术水平和接受文学遗产问题〉的几点意见》^①认为叶文“旧文学技术是高是低”这样的提法就有问题,不同意叶文“对过去的文学遗产只能作为一件史料去研究”的观点,更不同意叶文对《水浒传》、

^① 王子野:《〈关于中国旧文学的技术水平和接受文学遗产问题〉的几点意见》,上海:《文汇报》,1949年第1卷第7期。

《红楼梦》等的片面分析。文宾《一条走不通的道路》^①也反对叶文观点。颜默《关于接受中国旧文学遗产问题》^②由此引申：“今天要建立马列主义的批判旧文学遗产的新态度，问题还应该比陈叶两同志所争持的更扩大深入，并希望吸收各界注意此问题的人士参加。”

这场讨论不仅有学者和普通读者参加，一些高校中文系也加入进来。《文艺报》1950年第二卷第二期发表的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教员互助小组《我们对于接受文学遗产的意见》可视为代表高校中文系的表态。武汉大学中文系认识到这次讨论的重要意义：“樊平先生最初提出的问题本来很小，可是一扩大到对遗产的态度时，便立刻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就充分地表示这个问题的现实性和广泛性，其被人注意，绝非偶然。”他们的态度是应该继承遗产，但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无理由不去批判地吸收一切有利于我们的东西来充实条件的准备。在另外一方面，既然肯定了文学作品内容与技术的有机联系，也就可以充用这个标准来估定遗产的价值。我们可以在遗产中吸收进步的方面，它教我们该怎么作；也可以观察落后的方面，它教我们不该怎么作。所以照我们的理解：接受遗产必须具备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状的认识，通过扬弃的过程与保留的过程。

武汉大学中文系同意陈涌接受人民性的内容和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这两点。至于怎样接受，认为必须具有正确的思想认识和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最基本的就是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文学史、文学批评诸项目，次要的则有美

① 文宾：《一条走不通的道路》，上海：《文汇报》，1949年第1卷第7期。

② 颜默：《关于接受中国旧文学遗产问题》，上海：《文汇报》，1949年第1卷第7期。

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乃至民俗学等等。

这场讨论基本坚持了马克思文艺理论原则,通过这场讨论,许多人对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有了比较正确的把握。

随后的几年中,关于继承文学遗产问题没有成为理论热点,只有零星的文章发表。《新建设》第四十八期发表了翦伯赞的《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对一些古代作家有所评价。对此程千帆发表《关于对待祖国文化遗产问题的意见》^①一文,不同意翦文关于评价古代作家的若干论点,该文认为:“注重以历史发生时的条件来说明历史事实,这自然是对的,但是注重历史发生时的条件,并不等于可以把这些条件孤立起来,或将历史事实的传承关系割断。”1953年《西南文艺》第四期发表了李长路《向我国文学遗产学习》,这篇文章是作者在《西南文艺》通讯员会议上所作的专题报告。文内对中国三千年来文学发展的情况,作了较全面的概括的介绍,对文学遗产的评价较高。例如评价《红楼梦》这部书是我国一部极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除《水浒》外在章回小说中无与伦比,《红楼梦》发挥了《水浒传》与《金瓶梅》所不能发挥的东西,这就是对更广泛的妇女性格的描写。同年《文艺报》第十四期“读者中来”发表徐士年《严肃对待我们的文学遗产》一文,批评了李长路观点,认为其对古典文学的评价过高。

1953年9月24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副主席周扬作了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报告再次重申了批判继承文学遗产的态度和方法:

一切作家、艺术家都必须认真地学习自己民族的文学

^① 程千帆:《关于对待祖国文化遗产问题的意见》,北京:《文艺报》,1953年4月。

艺术遗产,把继承并发扬民族遗产的优良传统引为己任。

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工作,就成为我们文学艺术事业上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我们对待遗产又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我们不是把遗产无区别地、全部地接受,而必须是有选择地只接受其中健康的、有生命的、有益于人民的部分,首先必须将遗产中的民主性和进步性的部分与封建性和落后性的部分加以区别,将现实主义的部分和反现实主义的部分加以区别。我们文学艺术遗产中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丰富,现在是没有人能够怀疑的了;这是我们所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的。我们应当从学习古典作品中来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的过去,以便更好地来表现现代,指出现在的斗争和过去的斗争之间不可分的联系,从而用爱国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断然地抛弃遗产中一切反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的东西。

这一报告为今后的“批判地继承”古典文学遗产指明了方向。为了响应“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工作”的重要任务,《光明日报》创办了《文学遗产》副刊,于1954年3月1日刊发第一期。其《发刊词》说:“运用科学的观点与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对我们文学遗产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但是,1954年到1955年进行的全国性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事实上打乱了清理文学遗产的步伐。由于毛泽东号召开展对以俞平伯为代表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于1954年10月31日至1955年2月8日,召开了8次扩大联席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文艺报》的错误展开批评讨论。在1954年12月

8日的联席会议上,周扬作了长篇发言《我们必须战斗》,要求文化界、学术界毫无例外地投身“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斗争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专题批判小组,撰写批判文章。这次批判运动持续了一年之久。在这期间,报刊发表了知名作家、学者的大量批判性文章。1955年3月到1956年4月,北京三联书店共出版了收录这次运动中发表的论文的《胡适思想批判》8辑,近二百万字,另外一些出版社也出版有类似的批判文集。

从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开始,“批判地继承”首先表现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对古典文学进行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这一年,李希凡等人还写了《论红楼梦悲剧冲突的时代意义》、《论红楼梦的人民性》等研究文章,显示了这一走向。其他人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同样有着比较一致的理论倾向,如徐士年的《试谈〈三国演义〉的思想性》、顾学颉的《试谈〈三国演义〉的人民性》、刘知渐的《试论如何正确理解〈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冯雪峰《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等等。

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批判“厚古薄今”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民生产总值有了较大提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迫切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年党中央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

1956年2月,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在颐年堂开会时向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建议,被毛主席采纳。5月26日,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对首都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提出要把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同政治区分开,应该“有独立思

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造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提出:

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进行批判,但是,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作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这里实际上是重申了对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的方针,但是更加强调继承的必要性。1957年5月7日,周扬在《在美术界展开思想批判座谈会上的发言》里也说:“目前第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向遗产学习,在不懂它的时候,不要乱批评它、反驳它。”这种强调向遗产学习的态度与此前偏重于批判是不同的。

“双百”方针的提出,为古典文学研究界带来了活力。许多学者发表文章,对“双百”方针的提出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歌颂。1956年7月《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连续发表了几组《笔谈“百家争鸣”》的文章,文章纷纷表示要在“双百”方针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高度严肃的态度对古典文学进行深入的切实的研究,为繁荣学术研究作出贡献。

在反省过去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的同时,在古典文学研究界也就一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开展了争鸣与辩论。如1955年至1956年《光明日报》陆续刊登了一系列对李煜词的讨论的文章,1956年至1957年各报刊比较集中地对南戏《琵琶记》展开讨论,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讨论的题目虽然都是一些具体问题,但实际上不限于李煜词、《琵琶记》本身,而是涉及古典诗词、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涉及如何认识与评价古典文学的主题思想、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倾向等

问题。在这些讨论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导致的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的错误,因此,或多或少犯有强调批判、忽略继承的错误。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祖国有许多优秀的文学遗产,是应当继承的。如1956年7月28日《天津日报》发表的司马牧《不要割断古典诗歌的传统》、1956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朱偁《略论继承诗词歌赋的传统问题》、1956年11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罗根泽《如何接受诗词歌赋的优良传统》、1956年12期《文艺月报》发表的杨汝纲《学习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1957年4期《红岩》发表的公木《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1957年6期《长江文艺》发表的剑奇《继承古典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等,都强调在马克思列宁思想指导下,继承文学传统中优秀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部分。

1956年,为了纪念伟大的文学家鲁迅诞辰七十五周年,文艺界举办了许多活动,大量纪念文章被发表,其中也包括一些学习鲁迅清理文学遗产的文章。《文史哲》1956年第10期发表张志岳《试论鲁迅与中国文学遗产》,文章分为“革命事业的有机部分”、“中国文学战斗传统的发掘”、“实事求是的精神与科学的方法”和“辛勤的劳动与辉煌的业绩”四个部分。文章说,综合鲁迅一生整理、研究古典文学的过程,始终是他思想的发展、战斗的实践密切地结合着的。鲁迅从反侵略、反封建的意义上广泛地发掘了一系列的反抗性的作品,显示了中国文学的战斗传统。因为鲁迅“具备了人民意识,逐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所以能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注意到文学与时代及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

刘绶松《鲁迅——祖国文学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①驳斥了某些人认为鲁迅漠视文学遗产的论断。鲁迅说过不要青年人

^① 刘绶松:《鲁迅——祖国文学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北京:《光明日报》,1956年10月14日。

读古书的话,是因为他认识到整理国故是把青年拉回故纸堆中去,是扼杀新文学,也是混淆了古典文学的真实面貌。鲁迅有关古典文学的言论,“深刻、警辟地阐明了祖国文学遗产的伟大价值,精悍有力地打击了那些别有用心地诬蔑和歪曲祖国文学遗产的谬论邪说”。“根据他自己的长期探索和亲身体会,鲁迅对整理我国文学遗产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卓越的见解。”“特别看重人民口头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鲁迅最为重要的卓越见解。”“在衡论古代作家方面,鲁迅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指示。”等等。

舒芜《古鼎的金光和古剑的血迹》^①从鲁迅用古鼎的故事为喻反对朱光潜“静穆”美学谈起,谈到:

鲁迅先生一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进行了一贯的辉煌的斗争。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恢复古鼎上的金光,恢复它是一件新东西的时候的崭新、雪白、锋棱和光泽。他从各个方面,用各种方法,来清洗堆积在古典文学遗产上的历史的尘垢。

这些文章借纪念鲁迅而发挥,实际上是通过学习鲁迅对文学遗产的态度来重申批判地继承的原则。

然而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而出现的研究热潮并没有持续太久,来自政治运动的冲击又开始了。1957年4月27日,根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此后,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和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插红旗,拔白旗,“兴无灭资”,批判了一大批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① 舒芜:《古鼎的金光和古剑的血迹》,北京:《光明日报》,1956年10月28日。